

■ 聚 焦

李辉中短篇小说在黑暗中想象光明

□鲁太光

第一次阅读李辉的中篇小说《寻找王金叶》，被一种“震惊”感所捕获：为小说中由郑警察、韩警察、冯文书所呈现的丑陋世相所震惊；为吴霞如蛹化蝶般、由丑陋的世界出发，向着美丽的世界艰难蜕变而震惊；当然，更为小说中的憨痴汉子温连起一诺千金的信义精神所震惊——仅仅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海上客临终之前的一句无头无尾的嘱托，他就毅然决然地离开家乡——一座民风淳朴的海中小岛，来到了红尘滚滚的“龙湾港区”，一头扑进五花八门的人群中，寻找那位“莫须有”的王金叶，即使遍遭挫折，屡屡碰壁，也痴心不改，几乎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以一人之信义，对抗举世之无情，这是怎样的精神魅力！也正是在温连起的精神魅力感召下，风尘女子吴霞才意识到自己的“今是而昨非”，近乎决绝地告别过去，加入到温连起的行列中。这也是小说结尾时，我们感到浓重的黑暗渐次散去，熹微的光明次第涌来的主要原因——原来“愚公”（温连起）真的可以感天动地，移走“大山”，移走压在“吴霞”和我们心中的不洁之物，使我们疏渝五脏，澡雪精神，向着真，向着善，向着美，前进，前进，再前进！而这对纯粹精神的礼赞，才是小说令人震惊的源头所在。

由《寻找王金叶》所营造的令人震惊的小说世界，我想到了作者，想到了与作者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他有着怎样的心灵世界？是什么样的事情触发了他的灵感，使他的精神之火熊熊燃烧起来，照亮了跋涉在“黑暗”中的温连起（这是作者理念的显现）呢？毕竟，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今天，倾情礼赞诸如信义、真诚、勇气之类纯粹的精神，并非易事。

这一切，我都有朦朦胧胧的感觉与揣测，但是直到2009年我与李辉不期而遇，并有了一次深入交流后，才有了清晰的答案。

《寻找王金叶》果然是与现实作斗争的产物！

李辉告诉我，在为生计而四处奔波的时候，常常为发生在身边的“灰色”的人、事、情所缠绕，并为之而懊恼、失望，欲摆脱而不得，久而久之，自己心里竟也蒙上了一层灰色，但偶然发生的一件事，却彻底改变了他的心境：某天，在灵山岛办完事后，他搭乘轮渡回家，轮渡即将到达码头时，一位乘客急于下船，一直往岸边，因为用力过大，一不小心，跌落大海，而由于惯性，重达几十吨的轮渡正在向码头靠去，如果轮渡与码头相撞，落水的乘客必然被挤成齑粉。就在这危急时刻，二三十名身强力壮的乘客（李辉也在此列）纷纷跳入大海，双脚蹬住码头，双手推着轮渡，减缓了轮渡靠岸的速度，并渐渐将轮渡推离码头……

李辉告诉我，就是这件事情，使他看到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光与热，使他的心境一下子开朗起来，再加上曾经工作过的小海岛上的渔民们的淳朴与重然诺，温连起这个人物一下子就“活”了起来……当然，那些令他灰心的人与物做了故事

■ 看小说

陈旭红《亲和酒》人给人带来幸福

陈旭红的作品有一种雍容的氛围和宽厚的胸怀，并且，她习惯在家庭、家族这个空间里来塑造人物和叙述故事。新作《亲和酒》（《长江文艺》2010年第5期）并没有紧密的故事过程，它叙述陈氏家族三个后人陈世勛、陈世春、陈世廷为让空荡、寂寞、沉闷的湾子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而付出的努力。富裕了的乡村，乡亲们之间的来往少了；日子好了的乡村，人口越来越少了，这让“义和陈氏”的两个长辈陈世勛、陈世春很难过。临近中秋节的时候，陈世勛、陈世春召集湾子里的人聚会，商议在中秋节搞活动。中秋节锣鼓喧天，乡云来云，世勛、世春在众人的欢呼中表演了拳术和节目，亲近近邻聚在一，谈古论今，无不畅快。重阳节，陈氏家族漂泊海外的长辈陈世廷，带着海外的晚辈回来了。陈氏家族家家户户在外面的子孙都回到湾子里办“亲和酒”，祭祖认亲、看家谱、聊家常、追溯家族渊源、叙谈家长里短。在壮观的后辈身影中，长辈们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幸福。这种幸福的况味是很难用语言叙述的，但作者以古朴的语言、从容的节奏、平常的细节烘托出了几代同堂、热闹非凡、幸福悠长的氛围。作品巧妙地对都市化潮流中乡村人幸福感的失落与建构提出了批评与建议，由此显得雍容而宽广。

冉正万《纯生活》来自大自然的报复

冉正万的《纯生活》（《人民文学》2010年第5期）叙述的故事似乎极不可信。

一个家族因为在久远的时代得罪了一只山魃，而被其他的山魃攻击，从此这个家族的世代男人都要患腿疾并截肢，否则就会早逝。姑父因为腿疼去医院检查，医院诊断为骨癌，因为姑父截肢。姑父并不承认医生的诊断，因为他知道这个家族与山魃结下的仇恨及其历史。姑父的曾曾祖父曾经收养了一只独腿的雌性山魃，当姑父发现山魃与他独腿性山魃约会后，出于嫉妒，姑父砍断了独腿山魃约会时用来依靠身体的树枝，雌性山魃感受到羞辱而自杀，雄性山魃则开始报复这个家族。姑父的父亲因为腿疼而去世，姑父的儿子因为发现的早而病情截肢，姑父8岁的孙子决定长大后找一个独腿的女人作为妻，以接受山魃的惩罚并使后代得以解脱。尽管在作品中，姑父是乐观的，他觉得自己比父亲幸运，因为父亲没有条件截肢；表哥也是乐观的，因为他只截掉了踝关节以下的部分；表哥的儿子也是快乐的，因为他不惧怕报应的到来并做好了准备；作者的叙述也是轻松的、机巧的……但这仍是一个令人备感沉重的故事。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我们已经见到很多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我们对自然肆无忌惮的践踏和索取，这种惩罚和惩罚依然将以各种形式继续，人类也将继续承受，就如姑父这个家族所承受的一样。从医学的角度讲，骨癌并不是遗传性疾病，但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可能会一代遗传一代，由此，这个看似荒诞的故事又具有可以相信的逻辑。

（李鲁平）

的背景。由此，我“破译”了李辉的“心灵密码”，得以进入他的小说世界——这是一个由于不满现实中的“灰色”甚至“黑色”因素弥漫，因而与之激烈斗争而激发、建构起来的想象的光明世界。

不妨再以《寻找王金叶》为例，阐释这一点。

在这个小说中，那些“灰色”的因素几乎无处不在，令人压抑。小说中的韩警察和郑警察是这“灰色”的典型代表，他们不仅在物质上经常占吴霞的便宜，而且还时时在情感上揩吴霞的油，然而，当吴霞为了自己良心的解脱，求来他们帮忙查找王金叶时——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他们却翻脸不认人。冯文书是另一个“灰色”的角色，这是一个丑陋的存在，一个市侩。在她那里，没有道德，没有信义，没有好坏，只有权力。她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权力的象征——管委会的一把手，而把所有的工作推到一边。就是在这些“灰色”力量的纠缠下，原本向着光明的方向艰难而执著地跋涉的毛主任倒下了，这令人绝望！然而，就是这令人绝望的“灰色”唤醒了沉睡的光亮——温连起，这个“海外仙”般的人物，从遥远的海岛上，踏波而来，以一己之光亮，照亮无边之黑暗。在与这些“灰色”的力量斗争的过程中，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他没有像毛主任那样，在屡屡失败中丧失信心，中途倒下。最后，他以连续的失败，换来了最大的胜利：吴霞，那徘徊在泥淖中的风尘女子，终于被她唤醒了，穿越黑暗，跋涉到自己人生的光明彼岸。这也是这篇小说中“寻找”这个关键词的意义之所在。在连续的“寻找”中，那个“莫须有”的王金叶渐渐清晰起来，因为，那个告别“昨日”奔向“明天”的吴霞，就是理想中的王金叶；在连续的“寻找”中，那茫无涯际的黑暗终于消散了，因为，找到了王金叶，我们就找到了希望，找到了力量，找到了光明……

《寻找王金叶》在与黑暗的斗争中创造了光明，令人穿越绝望，看到希望，穿越大悲，体验大喜。但李辉的大多数作品，却没有在与“灰色”生活的斗争中提炼出明显的亮色，因而往往令人在这浓重的“灰色”中迷失，惆怅，发出一声叹息。但实际上，在这些小说中，作者虽未找到光亮之所在，可他与生活之中的“灰色”同样势不两立，因而竭力批判之，挫败之。在这深切的批判背后，跃动着的是作者的痛苦之心，是作者对光亮的希冀之心。这正如顾城的诗所传达的于绝望中创造希望的不屈信念——“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我想回家》和《你是他的药》是李辉这方面的代表作。

《我想回家》写的是一位农村老人在城市里的奇异遭遇。冯望田是一位老农民，家里没地了，又闲不住，因而无所适从。他做乡长的儿子怕他闲出毛病来，便把他介绍到朋友刘忠专的建筑工地看大门。老人一是觉得不能白拿人家的钱，

二是觉得刘忠专是儿子的朋友，他的事业跟自己也有一定的关系，于是看起大门来格外尽心尽力。在深夜蹲守时，他抓住了一个偷建筑材料的小工，没想到这个小工在刘忠专面前贼喊捉贼，反咬一口，说他跟冯望田是一伙的，因为分赃不均冯望田才举报了他。刘忠专由于对社会上的种种“潜规则”过于熟练，因而顺理成章地以这些“潜规则”理解人与事。冯望田老人由此陷入无边的尴尬之中。为了讨回自己的清白，老人可谓费尽心机，吃尽苦头。他找刘忠专解释，刘忠专总是语焉不详地敷衍他；他找那小工求证，那小工反而变本加厉，竟真的要老人跟他“合伙”；他想拿钱从小工那里买句实话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却又被误解、侮辱……最后，还是在当地有名的痞子康国泰“帮助”下，老人才讨回了自己的清白。可讨回清白的老人，反而觉得自己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联系到小说中刘忠专与办公室里的“秘书”们不清不白的关系，联系到刘忠专为了这个工程不得不与种种面貌模糊的人打交道等怪现象，冯望田老人的奇异遭遇便不再奇异，在一个灰色的大环境中，想独自清白是不可能的！李辉在与自己较劲，与小说中的人物较劲，甚至与读者较劲，通过冯望田的尴尬遭遇建构起一个灰色的世界，其真正目的是想呈现这灰色世界的邪恶，促使人们想象一个清白的世界，呼唤一种清白的生活。在当下语境中，这种批判无疑是有力的，必要的。

如果说《我想回家》中冯望田的遭遇让人感到奇怪的话，那么《你是他的药》所呈现的，简直就是一个荒诞的世界了。某副局长得了癌症，虽治疗比较成功，可出院后，他依然沮丧不堪，连日来一言不发，了无生气。他的妻子想尽了办法，仍然无济于事。谁料想，某日妻子上街目睹了一桩交通事故惨案后，惊悚不堪，回家后，下意识地把这件事讲了出来，这位原本一蹶不振的副局长竟“绝处逢生”，兴奋起来，要妻子领他去散步，去看案发现场……兴奋一段时间后，他又消沉下去，直到再次听到别人死亡的消息才再次振作，而且，越是与他关系密切的人的死亡，越是离奇的死亡，越是年轻的死亡，越让他兴奋……时间一长，妻子恐惧地发现，自己的丈夫不仅身体有毛病，而且“脑子”也有毛病了——他把别人的死亡当做“治疗”自己的良药了！而且，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竟然决定对周围的人“下手”。这个发现，让妻子恐慌不已，陷入精神折磨之中。最后，无法自拔的她，终于自戕，成了丈夫治疗自己的最好也是最后的“良药”。

读完这篇小说，我同样惊恐不已。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先生发现五千年中国历史的“夹缝”中写满了“吃人”两个字，发现封建的中国历史是人类的筵宴；在《药》中，他发现为理想而奋斗者的鲜血竟然成了华老栓、华小栓们“治病”的人血馒头。这让他激愤不已，痛心不已。而李辉这一近似攫心自食的艺术发现，几乎包含着同样的痛感、同样的批判法则。在一个物质利益至上的世界中，在一个以名利为最高“奖赏”的世界中，在一个缺乏道德理想和人文关怀的世界中，人很容易异化，很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魔鬼）……因而，这样的揭示与批判，便饱含着一种对理想社会形态、理想人格、理想精神的呼吁。

这便是李辉的小说世界。在与现实磕磕绊绊的接触、碰撞中，发现黑暗，吞噬黑暗，将其化为呼唤光明、培育光明的动力。

这样的写作极其艰苦，需要强大的精神和十足的耐心，相信李辉能够经受得住这样的考验。李辉性情敦厚，意志坚定，且有如温连起一样近乎憨痴的耐力，这使他能文学的天地里走得更远。

■ 第一感受

向小说大师致敬

□孔繁壮

邱华栋三卷本读书笔记《静夜高颂——对66位伟大作家的心灵访问》（凤凰联动出版公司出版）收录了他对二十世纪66位小说家的评述。三本书一共70万字，分为欧洲卷、美洲大洋州卷、亚洲非洲卷，是他花了3年的时间，根据过去15年里零星写下的书评、笔记、札记，扩充和整理出来的，是他关于二十世纪小说的潮流在各个大陆之间转换和发展的一次全景式的描述。

1980年，邱华栋11岁的时候，读到一本没有封皮的外国小说，那还是邻居大哥推荐给他的：“这可是一本很好的小说啊，你好好看看。”当时，邱华栋已经囫圇吞枣地读过了《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和《三国演义》，是见书就要读的。那本没有封面的书讲述了两个美国普通人的生活悲剧：其中一个是从俄罗斯到美国的犹太人，他是一个雄心勃勃要创造新生活的人，结果却到处碰壁，阴霉透顶；另外一个意大利移民，他本来要去抢劫那个犹太人的店铺，但后来却开始帮助他了。小说细致地讲述了这两个男人在美国社会里的纠葛和挣扎。小说的语言朴实、幽默，又饱含辛酸。由于那本书没有封皮和扉页，邱华栋一直不知道那是一本什么小说。十年之后，在武汉大学的图书馆里，邱华栋才发现，原来，那本书是美国犹太作家马拉默德的《伙计》。

这是邱华栋最早接触外国小说的经历。后来，他就经常阅读各类书籍，尤其是小说，读得天昏地暗，既读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明清世情小说，也读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汉语小说，两岸三地的都看，另外，他尤其重视阅读二十世纪的外国小说——最近三十年翻译成中文的外国小说，只要是邱华栋觉得应该加以留意的，大体都收藏和阅读过，还在报纸上撰写书评。久而久之，在邱华栋的脑海里，二十世纪小说家的作品，就形成了一幅在空间和时间上连续的图像，这些作家不断创新，不断地改变着小说的形式和面貌，形成了一股互相有联系的创新浪潮。在时间上从二十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左右开始，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前后跨度大概百年。空间上，则形成了从欧洲到北美洲，又从北美洲到拉丁美洲，然后，又从拉丁美洲到非洲和亚洲的“小说的大陆漂移”——邱华栋就这样建立了他的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的全景观，资料详实，文风朴实耐看。

在欧洲卷中，大部分作家已经去世，从詹姆斯·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开始，然后是对欧洲各种语言的小说大家的评述，最后包括了米兰·昆德拉、埃科、君特·格拉斯这三位活着的作家。美洲大洋州卷则由福克纳和海明威作为起点，到帕特里克·怀特、托马斯·品钦、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胡·巴尔加斯·略萨为止。第三卷则是亚洲非洲卷，索因卡、阿契比、拉什迪、大江健三郎、奈保尔、哈金、莫言这些作家，创造出一种亚洲和非洲的、更加民族化的和无国界特征的新文学，形成了最近三十年新的文学潮流。这66位小说家，他们不断创新，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存在主义、意识流到新小说和新新小说，从新寓言派到后殖民主义作家，从黑色幽默到荒诞派，从少数民族裔作家到无国界作家群，顽强地改变着小说的形式和面貌，形成了一股互相有联系的创新浪潮。比如，卡夫卡对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了影响，而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又对大江健三郎和莫言产生了影响。杰出作家之间的关系是继承、借鉴和发扬的关系，后辈的杰出作家往往可以在前辈作家的激发之下爆发出创造力，继续引领文学潮流向前进，并形成了新的文学的历史。

小说是通向一个民族的心灵最快捷的通道，在消逝之余就能领会一个民族的生活面貌、心灵世界和精神状态。二十世纪的小说和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一样，处于最为丰富、复杂的一个世纪。一百多年来，小说的发展令人眼花缭乱，五彩缤纷。邱华栋精心地选择了这66位作家，构成了这三本空间和时间里上延续性的读书笔记，就是为了解读者提供一个大致

的二十世纪小说发展的脉络。就是这些作家，构成了二十世纪小说发展的山脊线，构成了二十世纪小说发展和创新的连续性的、波澜壮阔的画面，没有这些小说家，二十世纪小说的魅力就会立即丧失大半。

■ 短 评

万般柔情寄托于“水”

□张立群

诉，再次涉及到“水”的意象，同样也涉及“神的恩泽”。把真实而纯净的感情作为一种生命的领受，此刻，“我”沉醉，但不喧哗和迷茫，构成了一道特有的风景。

徐红曾说：“我认为诗歌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应该向美向善。好的诗歌是积极的、深邃的、本真的，具有诗美特质和鲜活的时代气息，浸润着美好的情结。”“真”使其诗纯净透明，“善”使其诗温婉祥和，“美”使其诗具有耐读的特质，而三者的交叉使徐红的诗具有单一而又多层的质地。

长期以来，女诗人由于性别原因，常常会给人留下失之柔弱、感性、视野狭窄的印象，但事

■ 关 注

目前，诗歌已离家出走甚远。

诗歌究竟是贴近时代还是远离时代？诗歌究竟是贴近生活还是疏离生活？诗歌究竟是亲近民众还是隔膜于民众？对于这些事关诗歌繁荣与发展的大问题，我们不能不做出明确的回答。

其实，与时代相应是中国诗歌传统中最重要的精神内核。不是诗人有意要在诗中体现“时代气息”，尤其古人显然不会有这样的概念。而是真正的诗人总是身处自己的时代，关注自己置身其间的生活现实。如果屈原不关注楚国的命运，断难有《离骚》；如果不思在战乱中建功立业，就不会有“魏晋风骨”。如果李白不处于盛唐，恐也写不出浪漫之作。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史上就不会出现“三吏三别”。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人对“人生何事”的思考，也不会有《春江花月夜》那样的美轮美奂之作。诗与时代的关系十分显现。

再看“5·12”汶川大地震。巨大灾变成为人类共同的震撼与伤痛，刺激着人类共同的神经。而抗震救灾凝聚起空前的民族精神，唤醒了人们的良知，感召着诗人的灵魂。几乎是在完全自觉与自为的状态下，诗歌突然井喷，涌现出了像《孩子，拉住妈妈的手》《血脉能创造奇迹》《我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等催人泪下、感人奋进、让人刻骨铭心的作品。诗已许久未曾这样与民众亲近。这难道对我们没有启发吗？

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思维，呼唤诗歌回家，回到现实，回到民众。在诗的精神内涵上，应当高扬时代旋律，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焦点与社会热点，关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事业的方方面面，突出科学、民主、和谐等与时代同步的主题。而在美学价值上，应当包涵哲学、艺术、生活、情感、心理、语言等多重元素，丰富诗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在诗的表现方式上，那种散文化的铺排与述说式的表达，即使是在抗震救灾诗中反复出现，也未能让人记得几句。还是要抒情、明朗、短小，有一定的韵律感，让人好读好记，这是中国诗歌传统在文体形式上的生命力。

让诗回家，其实也就是呼唤好诗。而好诗尽管应当百花齐放、色彩多样，但有一些特质是共同的：

好诗的精神内涵是崇高与尊严的。以中国诗歌的传统精神而言，诗歌对社会生活和人的内心世界的作用是巨大的。所谓“不知耻，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多识草木虫鱼之名”等等。诗歌总是指向人类精神境界的最高处，体现出“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尊严。

这种尊严源于诗人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紧系于时代，把自我价值升华为安邦定国、促进国泰民安的追求，从而彰显出一种大气，并包含着丰富多彩的精神内容。无论时代怎样变迁，好的诗歌肯定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明灯，与卑微、琐屑、低俗、无聊是格格不入的。新时期以来的诗歌中，我们记得“归来的歌”，记得众多批判现实、渴求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力作，记得《致橡树》那样的格调，记得《我是青年》《干吗》《阳光，谁也不能垄断》等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作品。我们无法对这些“既有”的存在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在“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面对人类共同的灾难，面对生存与毁灭、死亡与救助，诗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崇高精神。“小我”已不复存在，大爱充满人间。诗人们用灵魂牵手，用爱心感应，与受灾群众血脉相连，使诗歌成为抗震救灾的精神支援。有的诗人，甚至身体力行，赴灾区救援。他们在忘我中实现了自我，在“大我”中升华了“小我”。这是近年来中国诗歌的一次灵魂大洗礼。

好诗充满人性关怀与悲悯情怀。古往今来，中国诗人总是以天下为己任，以民生为根本，以忧患为心结，以同情为吟咏的。对于民间疾苦，诗人们“一枝一叶总关情”，充满人性关怀与悲悯情怀。

悲悯情怀出自人类的良知。在中国诗歌传统中，不论是试图参与政治的士大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还是贫寒诗人感同身受的呼吁公平正义、悲天悯人无疑是中國詩歌美學的一種風範。但今天，一些作品在中国发展的地区不平衡中，选取乡村的落后或民众的愚昧与贫困，以个案为普遍，施以人文式的同情，这种“悲悯”轻飘而肤浅。“悲悯”本是人性关怀的情感体现，应建立在鲜活的生活真实之上，也应建立在作家的灵魂高尚之上。这种“悲悯”应是对国计民生的关注与大爱，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与大爱，而不是区儿女之情、戚戚小我之哀。与之相应，人性关怀也应有更为丰富的内容。它包含着对人的生命权、生存权、话语权乃至个人隐私的人格尊重。面对巨大灾变自不必说，即便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也应有所体现。例如对于教育、医疗、卫生、食品、健康的重视，对农村、农民、农业的关注等等，这些都必然应当成为当今诗歌的现实主题。

悲悯不等同于同情，而是一种精神力量，一种情感美德，一种爱

好的诗的美学趣味是高雅的。诗的美学趣味在本质上是指向高雅的。在中国传统诗歌中，诗歌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是追求至美的。这种美是人类精神慰藉的理想境界，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美学创造。好诗对于陶冶性情、达到内心和谐、进而通过传播提升民族的精神情感，有着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在实际的诗歌创作中，高下之分、文野之分历来存在。因之好诗总是在经过历史的淘洗而留存，只有时间和民众能验证其不朽。诗在追求高雅的同时，也不排除俗趣，但通俗不可媚俗，这是必须要把握的原则。如果诗人的思想境界、文化品位、情感素质低下，我建议最好不要做诗，做出来的诗注定是失败的。如果以机械进化论的观点，笼统地认为新诗比古诗好，当下的诗比新时期以来的诗好，自己的诗比别人的诗好，通过炒作让媒体渲染一下就好，这更是谬之千里了。

好诗除了上述三大要素外，还应在“文体形式”上有所探索。诗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其文体自有特色。自古而今，尽管诗体不断演变，但诗的抒情的本质特色没有改变，这正是其区别于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形式的地方。如何在继承中创造，在创造中出新，使诗在内容与形式上达到和谐，是当今诗人们不能面对的课题。

其实，许多女诗人在阅读和书写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起点”。在《我听见了水的天籁之音》《形而上》等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徐红深入事物本质的能力、进入深度和哲理的思考，这恰恰是徐红带给女性写作的某种启示。《欲望天堂》是徐红的一首较长的诗，在“水上”和“水下”的两个世界里，女性的生存欲望被诗人刻画得丰富而又细腻，深入。在使用“对话”，叙事等手法的前提下，“水上”女人的外在世界，和“水下”那些难以言说的复杂体验，折射出长久以来在道德束缚下，女性必须保持的优雅甚至必须履行的“责任”，但惟有欲望的世界才是深不可测的，这些发自女性内部的声音，使诗人在描写、深入“水”的意象的过程中，拓展了其表现的空间与可能。

徐红认为：“真诚的爱是幸福的最基本的元素。热爱生活的人就会幸福。”她是热爱生活的，也应当是幸福的。因为专注“水”的世界，又发现了美与幸福，徐红的诗歌便带有别样的韵味。

□曹纪祖

让诗回家